

# 张謇全集

1

公文



NLIC297087102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 张謇全集

1

公文

主编

李明勋 尤世玮

执行编辑 (以姓氏笔画排序)

张廷栖 陈 灵 赵 鹏 戴致君



NLIC2970871021

《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謇全集/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编委会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ISBN 978-7-5326-3517-7

I. ①张… II. ①李… ②尤… ③张… III. ①张謇(1853~1926)-全集 IV. ①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4564 号

ISBN 978-7-5326-3517-7



9 787532 635177 >

出版统筹 余 岚  
主任编辑 王圣良  
责任编辑 王继红 刘 琼 郁 蕙 竺金琳 解永健  
助理编辑 王成伟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张謇全集

(全八册)

李明勋 尤世玮主编 《张謇全集》编委会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金坛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410印张 41插页 6056千字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00元

ISBN 978-7-5326-3517-7/K·827

#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借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

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庋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

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 序 言

章开沅

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举办感动中国的十位人物评选活动。如果再要评选“20世纪感动中国的十位人物”，我将毫不犹豫地提名张謇为候选人物之一。因为他也曾经感动中国，而且其影响持续之久，事业经营之难，泽惠地区之广，都为时人所难以企及。

感动中国的人必定先受中国感动。张謇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这已经是无需说明的事情。但他受中国感动最深的一年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在日记上逐条记下条约的主要内容，并且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愤极语塞，但就是这句话，表达了多少悲愤、屈辱、忧虑之感！

为中国所感动的张謇，决定投身于革新中国并使之走向富强的伟大事业。正是从1895年开始，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都使中国为之感动。当时中国的新闻媒体虽然已经日渐增多，人们尚未知悉“炒作”之类话语，然而张謇的这些重大举措却无一不产生轰动效应。

1896年至1899年，他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历经千辛万苦，并且冒着极大的风险，在通州创办了大生纱厂。状元办厂（或下海）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张謇堪称一千多年以来科举史上的第一人。他长期经受试场蹉跌，参与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达20多次，前后总共耗费25年生命，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天之多。他攀登到科举生涯的顶峰，但却毅然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告别，把人生的坐标从做官转为做事，而且是脚踏实地办实业与教育两件大事、新事。对于一个年逾不惑的科举文士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大生纱厂的初见成效，感动了中国，更感动了张謇自己。他没有就此却

步,而是更为奋勇向前,兴办通海垦牧公司,创建通州师范学校,设立南通博物院,乃至参与举办南洋劝业会等等,无一不是开风气之先的大举措,无一不是在神州大地上萌现的新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张謇追逐的不是昙花一现的新潮时尚,更不是浮而不实的哗众取宠。他的每一步前进都是脚踏实地的,而且又是怀有远大目标的。归根究底,他着重考虑的并非个人名利而是社会福祉,也就是乡土与国家的根本利益。

张謇既脚踏实地又意在高远,他确实具有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他尽管宣称弃仕言商,然而却始终把工业放在首要的位置。他深刻地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他从创办大生纱厂入手,就是首先要抓住“工”这个根本。他起初还只限于试图从纺织业起步而奋起直追,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开幕,他发起组织劝业研究会,并认真研究光绪一朝(1874~1908)的海关贸易册,才“如寐始觉,如割始痛……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刚至柔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所谓“至柔至刚”也就是以后他所说的“至白至黑”,即着重发展纺织与钢铁两大工业系统,并以此为基础而营造独立的民族近代经济体系,以求摆脱祖国贫穷落后的悲惨命运,进而参与世界范围的“文明竞争”。

张謇当时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从经营事业的开始便有一个全局观念。从经济而言并非仅仅着眼于某一工厂,而是要逐步营造一个企业体系;从教育而言并非仅仅着眼于某一学校,而是要逐步营造一个文教体系。同时,他的事业又并非局限于实业与教育两大部类,而是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吴良镛院士称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意即这是中国首先按照总体规划建设的近代城市,诚非溢美之语。然而,他的最终目标又不是仅仅按照自己的理想建成这“第一城”,而是希望通过这个“理想城”(恕我杜撰)的示范与推广,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幸福的中国。直至他目睹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晚年,还念念不忘这个根本:“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

哉!”张謇具有如同宗教徒一般的虔诚,一步一步走向自己信仰的彼岸,当然这是人世的现实乐土而非虚无缥缈的天堂彼岸。

回想 1895 年,中国有 3 个人各自作出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与教育,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但是在 19 世纪末年,这三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知名度却是差异很大。孙中山尚未被国人所真正认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无非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小小逃亡者。张謇虽然以大魁天下赢得广泛仰慕,又以状元办厂的壮举感动了中国,但与康有为所策划的戊戌变法相较却是小巫见大巫。一度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百日维新与六君子的最终血染菜市,那才是中国最大的感动,康有为也即因此成为中外瞩目的头号热点人物。但是,随着变法的迅速夭折与自身的逃亡海外,再加上思想的日趋保守与保皇党内部的分歧涣散,康有为在国内的影响明显淡出。而张謇则凭借兴办实业的初试牛刀,逐渐取代了康梁的媒体聚焦位置。其所以如此,当然不仅仅是由于创办大生纱厂的成功,更为重要的还是由于他参与了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张謇虽说是不愿做官,但并非不关心政治,他已经进入商界,为了市场的稳定发育,更必然关心政治局势的变化。同时他也具备足够的条件关心政治,状元的称号加上大生业主构成其新的社会身份——绅商,而且俨然是东南地区绅商的领袖人物。他还拥有充沛的人脉资源,主要是与两江、两湖督抚的密切关系,还有前此 10 年与清流、帝党的深厚情谊。张謇在商界并非属于长袖善舞类型,然而办事(包括政治事务)却很善于运用这些社会资源,何况他本身亦已成为各界人士争相延揽的一项社会资源。

1900 年“东南互保”的策划与促成,不仅保持了东南市场的稳定,而且也提高了张謇的全国声望。他对刘坤一的建言:“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一语破的,堪称对庚子年中国局势的经典概括。“张殿撰”的大手笔不仅表现于八股文章,而且也表现于实业、教育与政治,这就使他在东南新旧精英群体中脱颖而出,与汤寿潜等若干大佬一起领导戊戌政变以后重新崛起的又一波维新潮流——立宪运动。张謇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庚子对戊戌的反动并没有对这个变法同路人造成损害,他不仅隐于市而且兴于市。乃至清朝政府迫



于形势而不得不做出预备立宪姿态时，康梁仍然作为通缉要犯被拒于国门之外，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遂通过预备立宪公会以及各地商会、地方自治团体等社会网络，连续发起三次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与戊戌时期维新派与帝党携手幻想通过自上而下的“诏谕革新”不同，20世纪初年的国内立宪派倒是切切实实做了大量社会动员工作，企图利用合法的自下而上的请愿运动来促使政府加快立宪步伐。

张謇再一次感动中国。1909年冬天，张謇在《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中慷慨陈词：“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张謇不幸而言中，国会请愿运动至于三即被消弭于俄顷，“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接踵而至，那就是张謇最不愿看见而又无可避免的革命狂飚终于降临这个神州古国。

革命的潮流不可阻挡，张謇经过反复思量，终于顺应共和潮流。尽管君主已被废弃，但他曾追求的目标，“进我人民于参预政权之地，而使之共负国家之责任”，也许还有实现的前景。张謇以同样的精诚参与了“南北议和”的幕后协调，也参与了民国肇建的若干筹议，甚至还一度担任北京政府公职，为经济立法殚精竭虑。但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真诚的革命派与真诚的立宪派，都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政局失望。张謇拒绝了袁世凯的帝制，但是他也没有介入南方反袁斗争的“护国”与“护法”。他对政治已经失望而又迷惘，只有保持始终如一的“村落主义”略尽国民责任。他已经远离政治主流，只能在军阀争夺地盘的缝隙中千方百计保全通海一隅，继续苦心孤诣地营造他那心血铸成的小小“新世界”。“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风前”。张謇苦心孤诣营造30年以上的“新世界”，始终未能推广到全国（甚至江苏一省），他的悲愤自然是极为深沉的。

早在1929年，胡适曾给张謇以高度评价，说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张謇的结局诚然带有悲剧性，然而

中国近代史上真正伟大的英雄也大多如此。孙中山百折不挠地为新中国奋斗40年,临终前的语言也仍然充满遗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个人的生命毕竟是短暂的,而改造落后积弱已久的中国,则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很难对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作更高的要求。张謇事业的失败与自责太深,可能正是由于他自身角色的错位。他原本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可以也应该关心公益回报社会,但是却需要恪守客观的分际,还得准确估量自己的承受能力。可是,他却越位承揽了许多本应由政府办理的事情,同时也就过度耗费了许多本应投入再生产的资财。对于社会而言,他可以为政府“拾遗补阙”,然而却不应扮演“二政府”的角色。对于企业而言,他是理所当然的法人代表,然而更应该尊重董事会的民主运作,特别是需要建立完美的制度与机制,切切不可大家长自居。张謇晚年的自责,大多是停留于“壮志未酬”的慨叹,而缺少更为深沉的企业运营方面的自我反思,这才是这个伟大人物的真正悲剧,也是他的历史局限之所在。

最后,我们特别感激张謇,因为他不仅在通海等地留下自己的事业与思想,同时还留下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张謇生前就非常重视相关文献、档案、手稿的保存,逝世以后不过5年,其子孝若即编辑《张季子九录》,凡90卷、线装5函、29册,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为后世研究张謇提供极大方便。但《九录》所收文献数量毕竟有限,加以分类过细,难免凌乱错显,有些重要文献年代判断亦有失误。“文革”以后,随着张謇研究迅速发展,国内外学者自然难以满足于《九录》这样有限的文献结集。作为当年《九录》的出版者,中华书局决定出版《张謇全集》,并首先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兹事体大,必须由南通本地学者集思广益共同承担。这个意见迅速获得中华书局与南通相关负责人士认可。

正好1984年张謇研究中心在南通正式成立,编辑《张謇全集》便成为中心的主体工作。在中心领导机构——干事会两任会长曹丛坡、李明勋的主持下,经过近10年的艰苦工作,1994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付梓问世,6卷7册共400万字,为张謇研究提供了更多珍贵史料。可惜由于出版时间过于急迫,误植之处甚多,使学者难以直接引用,再则编辑体例亦有不足之处,因此在2003年扬州举办的纪念张謇150周年诞辰高级论坛上,国内外张謇研

究者均有重新编辑出版的诚恳建言。

南通方面对于学界意见非常重视,中共南通市委宣传文化领导小组,随即组建了新编《张謇全集》领导小组和编辑委员会,仍然经由张謇研究中心启动了新编《张謇全集》大型学术工程。2007年新编《张謇全集》申报国家清史文献编纂重大项目。当年12月通过专家评审,正式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并委托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经过编辑委员会多次认真商讨,并且吸收了清史编委会专家评审的宝贵建议,新编《张謇全集》在编辑体例、文献收罗与考订,校勘诸多方面已有更为明显的改进。深信这部大型集结的出版,必将推动张謇研究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我有幸于1962年初访南通,从此与张謇研究结下不解之缘,50年来与张氏家族成员及南通几代研究者建立终生不渝的深挚情谊。在新编《张謇全集》出版问世之际,我再次为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民祝福并且衷心表达感激之忱。

即以此为序。

辛卯盛夏于桂子山上



## 凡 例

一、本书以文稿成文时间顺序为经,以文稿种类为纬编排。全书共分八册,依次是:1.公文;2.函电(上);3.函电(下);4.论说、演说;5.章程、规约、告启、说略、帐略;6.艺文杂著;7.诗词、联语;8.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

二、收入本书的张謇文章、诗词主要出处是:

1. 张謇的文集、专著(包括手稿影印本、石印本),如《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张季直文钞》、《啬翁垦牧手牒》、《张殿撰教育手牒》等。

2. 当时的有关报纸、杂志,如《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政府公报》、《通海新报》、《公园日报》、《南通报》、《农学报》、《东方杂志》、《盐政杂志》、《督办运河工程局季刊》等。

3. 散见的张謇文稿和载有张謇文稿书刊的影印、复印件,如《张謇信稿》、《张季子九录校补稿》、《赵凤昌藏札》、《张謇与梅兰芳》等。

4. 南通市以及境内外其他地方档案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张謇文稿。

5. 同时代有关名人文集和史料书刊中保留和收录的张謇文稿,如《张之洞全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

6. 有关碑铭拓片、文稿抄件等。

三、对上述文稿在校勘编辑时采取以下原则:

1. 每篇文章的文末均标明该文的出处。为简便起见,出处一般只标书名(或档案名),不标版次、卷次、页码;《张季子九录》、《张季子九录校补稿》、《柳西草堂日记》亦简称《九录》、《校补稿》、《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藏件按双方协商一致的格式标注。书末附征引文献要目,以备读者查考。

2. 同一篇文章有多个版本,则以一较优版本为基础,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同时出校注;有时两个版本出入较大,则以一个版本的文章作正文,另一个版本的文章作为附录,以方便读者阅读比较。

3. 张謇的一些信函或文章常署张謇、张警兄弟两人的名字,或用两人的口吻进行写作,这种情况读者一般可以从行文中看出,编辑时未一一注明。张謇还有一些信函和文章有多人署名,编辑时尽量保留了合署人的名字,以保持历史的原貌。

4. 张謇一生为上司、同僚、朋友、亲属起草、撰写了不少奏呈、公牒、函电、诗词、联语,且大都被收入《张季子九录》,本书一如既往,分别收入各册。

四、本书编辑时对张謇文章、诗词的成文时间进行了考订,纠正了一些底本所署成文时间的失误。

1. 民国以前诗文的成文时间,同时署农历和公历,如: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1905. 3. 10)。

2. 民国元年开始,因为民国政府已规定用公历纪年,所以成文时间一般只署民国纪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如:民国八年(1919. 5. 29)。

3. 进入民国以后张謇所写的诗词和一些传、序、碑、铭等仍多署以干支或农历年份,对这部分诗文采取农历和公历并存的办法,如:民国十一年七月十三日(1922. 9. 4);《柳西草堂日记》均以农历记时,进入民国后虽署为民国某年,实为农历年份,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4. 有的诗文无法确定具体的成文月日,采取概略的纪年办法,如:清光绪十八年(1892)、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民国六年(1917. 8~9)等。

5. 有的诗文暂时无法考定具体的成文时间,诗词按《九录》编排次序,文章按前后文的关系,放在相应的时间段。其他只能确定年份的文章放在当年年末,无年份可考者,则置于卷末。

6. 张謇的报载文章,有的可作为成文日期,如部分告启。有的并非成文日期,此种情况或根据其他资料来确定成文日期,或根据见报时间判定其大致成文时间,置于书中相应的位置。

五、本书用简体字排印。根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工作通

则》第十一条规定：“文字尽量保持原貌，古今字、异体字、俗体字、通假字一般均仍原文，不作改动。确有必要改动者，以符合一般常用情形及文字发展源流为原则。生僻字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可改为通行字。”本书在校勘中作如下处理：

1. 保留人名中部分繁体字、异体字，如翁同龢的龢、徐积馀的馀、张督的督等。

2. 保留部分常见的通假字，如藉（借）、属（嘱）、蒐（搜）、圆（元）、俞（谕）、画（划）、豫（预）、帐（账）、振（赈）、蚤（早）、叠（迭）、象（像）、它（他）、展（辗）、覈（核）、裁（才）等。同一篇文章则保持一致。

3. 少数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古体字，虽未废除，但属生僻或已不常用，一律改为通行的简体字，如钜（巨）、摺（折）、馀（余）、闇（暗）、搨（拓）、媿（美）、裨（祸）、螳（蚁）、诤（托）、祇（只）、编辑（编辑）、股分（股份）、朝廷（朝廷）、邱壑（丘壑）、俛仰（俯仰）、及弟（第，表示序数）等。

4. 有些字如作为“覆辙”的“覆”、“变徵”的“徵”“於乎”的“於”时保留繁写，其他情况下一般都简作“复”、“征”“于”。

5. 有些动植物名称有不同的叫法和写法，如“鸚鵡”不改作“鸚鹄”。

六、本书在校勘中，错字置于〈〉内，订正之字、增补漏字置于[]内，衍文置于【】内，缺损或模糊难辨之字用□表示。

七、函电中收件人有时用名、有时用字、有时用职务，有的人名字还有不同的写法，编辑过程中全书同一个收件人只用一个名字，行文中原用的名字则予保留，如吴季诚又叫吴寄尘、吴季尘、吴寄诚，书中收件人只用吴季诚。

八、函电中的通函，即一封函电同时发给两人或多人，一般用注释说明之。

九、一些文中的横线“—”并非中文序数“一”，其作用为标明每个不同的项目。

十、文中的“如左”、“如右”相当于横排本的“如上”、“如下”，为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十一、少数文中夹用了一些本码（草码）数字，一仍其旧。

十二、部分表式无数量单位,或数字存在差错,因资料缺失已无从核对,请阅读使用时注意。

十三、信函中的外文信函,中文原稿已佚,所附中文为今人所译。

十四、原书中的外国国名、地名译名,如义国(意大利)、米国(美国)、散路易斯(圣路易斯)等,一律不作改动。

十五、本书附图据《张季子九录》。

编者